

我国城市化进程给城市教育带来的深层挑战及应对策略^{*}

——基于城市化先行国家正反经验的分析

文 冯大鸣

〔摘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学校教育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对当下挑战固然需积极应对,然而对“农民工二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城市家庭教育力何以保持”“城市学校怎样取信于家长与社会”等深层挑战同样值得关注。本文基于城市化先行国家正反经验的分析,提出城市教育面对这些深层挑战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城市化 城市教育 挑战 策略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学校教育正面临着因城市化而生的诸多挑战。迄今为社会所关注的挑战,主要是由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所带来的,包括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和设施达标、农民工义务教育学龄子女就近入读公办学校、基于户籍人口的教育供给向基于常住人口的教育供给的转变等问题对城市教育形成的直接挑战。积极应对当下这些挑战固然必要而必需,然而在这些当下挑战的背后,还有一些深层挑战同样值得关注。本文基于城市化先行国家正反经验,对这些深层挑战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

一、当下挑战背后的深层挑战

1. 农民工二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

目前,我国户籍不在城市的农民工总量已达 2.5 亿。^{〔1〕}随着这一人群数量的持续增长,城市流动儿童的

数量也不断上升。以北京市为例,2006 年的调查数据已显示,该市 0~14 岁的流动儿童总数已达 50.4 万,其中有 34.82% 流动儿童就出生在北京,每年在京流动人口的新生儿已接近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2〕}以北京市的数据来推断,农民工二代将成为我国城市中一个规模不小且持续增长的特定人群。目前,这个人群就读城市高中的政策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部分城市的职业高中已向这一人群开放),但从长久看,这一人群接受城市高中教育的政策阻隔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城市劳动大军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在城市的法定身份迟早会获得确认,其子女接受城市高中及高中后教育的政策阻隔也终将被消除。然而,教育政策阻隔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民工二代就能自然地融入城市社会。以城市化先行国之一的法国为例,流入城市的移民后代虽早已获得法定身份,在教育上享有平等权利甚至还享受某些附加的教育援助,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西方教育管理十年进展研究(2001-2010 年)”(11JHQ020)的部分成果。

但他们在社会态度、行为方式、社交对象、人生期待等诸多方面仍与城市原住民后代有很大的差别,被边缘化、被矮化、受歧视的感受长期存在,他们实际上一直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国 2005 年城市骚乱的爆发,正是移民后代长期不能融入城市社会的必然结果。虽然,我们不能将我国农民工二代与法国移民后代作简单类比,然而以上海为例,数据显示,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已占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的 80% 以上。^[3] 尽管解决农民工二代的城市社会融入同时涉及教育内外的多种因素,但无论如何,农民工二代的社会融入问题已是我国城市教育将面对的一项严峻挑战。

2. 城市家庭教育力何以保持

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以及与之并行发生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将对城市社会生态形成强烈的影响。以日本为例,其 20 世纪下半叶的高度城市化造成了城市儿童生活环境的重大变化:大量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扩大了城市闲散、失业、失意人群的子女,使周边儿童受到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城市快速的工作学习节奏和便捷交通工具的发展降低了人们的运动量,使儿童心理压力上升和体质下降同步发生;城市男女平等就业的环境在提高职业女性人数和女性事业成功机会的同时,也助推了新一代城市居民生育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增长,从而使城市家庭规模缩小,单亲家庭比例上升,不仅减少了儿童与同龄伙伴交往的机会,而且削弱了家长对儿童的正面引导力和教育力;个人电脑、手机以及虚拟游戏进入儿童生活,使儿童生活方式更趋于个别化,在进一步弱化家庭教育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儿童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和热情。结果,在家庭教育力下降的同时,因儿童个人中心倾向的养成而大大弱化了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对现代城市公民素养的培育形成了负面影响。日本的经历提醒我们,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层挑战不仅来自农民工二代的教育问题,而且也来自城市原住民后代的教育问题。我国目前总体城市化率虽然尚未达到日本的水平,但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已经表现出与上世纪末的日本十分相似的城市化人口生态特征,以上海为例,在大量农民工进城导致常住人口快速上升的同时,户籍人口却出现老龄化、家庭少子化的趋向,2011 年“全市户籍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口数量为 331 万人,占 23.4%;……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平均规模为 2.5 人”。^[4] 随之,家庭教育力减弱和儿童公共意识下降的问题也已端倪显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最近 30 多年来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尤其大城市得到严格执行,客观上助长了家长过度溺爱儿童的比例并提高了儿童形成自我中心人格倾向的几率。鉴此,如何帮助家庭保持其应有的教育力确是我国城市教育必须面对的挑战。

3. 城市学校怎样取信于家长与社会

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教育的第三个深层挑战,是学校如何获得家长和社会的信任。根据城市化先行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化率加速提升的阶段通常会出现城市学龄儿童人数快速增长和学校教育供给紧缺的矛盾。当政府不得不以大量新建学校来扩大城市教育供给时,成熟师资和办学积淀的缺乏会使许多新建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如人意,由此牵制公立学校教育质量改进的整体态势,进而导致民众对公立学校信任度的下降。另一方面,在城市化与全球化、信息化同时并进的年代,背景多样的资讯和更为多元的价值观在城市交汇,对学校教育惯常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知识传递方式形成了冲击,教师、校长在儿童心目中的权威性以及学校教育所拥有的社会信任度都趋于下降。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带来价值多元的背景下,教育界自身的疑虑和迷茫也导致了学校对一些正确的价值观不敢坚持或不知如何坚持,这就进一步动摇了学生、家长、社会对学校的信任。例如,2011 年英国发生震惊朝野的城市骚乱后,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在表示不能对骚乱作简单归因的同时,强调纪律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这些年来英国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缺乏对年轻人纪律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养成”是骚乱发生的原因之一。^[5] 戈夫的话暗示,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中,学校教育仍不能放弃对学生的价值引领。然而,在学校权威性和社会信任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学校教育要担当起价值引领的使命并不轻松,绝非教育大臣一个简单表态就能解决,而需要政策措施和技术手段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我国虽从未发生过类似于英、法的城市青少年骚乱,但近年我国城市教育在不断改革进步的同时却频受民众指摘,已反映出城市化消解民众对学校教育信任的一面,说明学校如何取信

于家长与社会,也是我国城市教育需要应对的一项挑战。

二、政府与教育界的备选策略

1.将儿童的生活方式培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项明确任务

农民工二代融入城市社会涉及两个必要前提,一是掌握在城市就业的必备知识与技能,二是养成适应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政策背景下,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以及与城市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实现,从而为达成上述第一个前提提供了保障。然而由于农民工目前的文化知识水平、从业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的邻里环境、人际交往范围以及家庭教育模式都与城市居民有较大的不同,因此其子女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存在着隔阂。这种隔阂若不消除,就会成为农民工二代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

关于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的关联,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吸纳新移民的澳大利亚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早在1999年,澳大利亚就把“成为能理解并珍视澳大利亚政府和公民生活体系的积极而明智的公民”^[6]等关乎儿童生活方式培育的内容纳入其教育战略目标体系之中。2008年的《墨尔本宣言》,再次把儿童生活方式培育的内容纳入了新一轮的国家教育目标体系之中。

在我国,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生活方式培育虽然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一些城市基层学校已开展了某些相关的探索。例如,上海的柳营路小学从2004年成为一所100%接受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公办学校。入读该校的农民工二代不仅与上海籍儿童的学习基础不同,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该校在探索改变教学方式的同时,特别编制了“81个天天好习惯”,“分为学习、做人、礼貌、卫生、饮食、阅读、安全、运动、劳动9大方面,涵盖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全部细化成‘操作点’。如,学习习惯方面,要求学生提前预习、专心听讲、爱提问题、及时改错、按时完成作业等;卫生习惯方面,则要求学生每晚洗脚、洗袜子,不随意席地而坐,随手整理好用具和衣物等。”^[7]很显然,其中部分“好习惯”已不是学校的传统“管辖”范围,而是在为这些儿童顺利融入

城市社会做准备,该校由此在农民工二代生活方式培育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倘若我们推广柳营路小学的经验,把农民工二代生活方式培育作为城市教育的一项明确任务,充分调动广大基层学校的实践智慧,便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农民工二代融入城市社会的挑战。

2.将家庭教育的全面、深度指导视为教育界的共同责任

日本等城市化先行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如何保持家庭的教育力将是社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是城市教育面临的挑战之一。关于儿童的公民素养培育,欧盟委员会在其《欧洲的公民教育》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目标:政治知识、批判思维和分析技能、态度与价值观、积极的参与。从《欧洲的公民教育》对实现这四个目标的分析和建议来看,培育儿童公民素养的任务不可能由学校独自担当。一方面学校需要与家庭甚至社区共同合作;另一方面,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要为家长提供专业支持,因为儿童公民素养培育涉及一系列家长不可能自动掌握的专门技能。

在家长对儿童的学业关注,城市化先行国家也已充分注意到城市化背景下家长工作节奏加快和母亲就业普遍的状况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OECD对2009年PISA测试结果的后续分析表明,“对于15岁儿童来说,在其小学一年级时家长经常伴其读书的学生2009年的PISA成绩明显高于那些家长很少伴读或完全不伴读的学生的成绩。”^[8]而且在这点上,完全不受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OECD的分析报告还指出:“许多家长在应对工作和家庭两头都有需求的矛盾时,看来总是腾不出足够的时间。而且家长常常因感到自己缺乏某些(学业方面的)技能而不愿意在其孩子的功课上提供什么帮助。”^[9]OECD的上述分析暗示,就家庭对儿童学习的影响而言,家庭的贫富与否或家长是否充分具备辅导功课的能力虽然是重要的,但家长对孩子学习活动的关注与陪伴或许更为重要。而恰恰在这点上,许多家长是存有误会的。这就启示我们,向家长传递这种可能根本转变家长态度的观点或结论,很可能比某一具体技能的指导更为关键。近20年来,我国城市中小学在家校合作、家庭教育指导方面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若从应对城市家庭教育力下降的挑

战来说,我们还需进一步为家庭提供更为全面、深度的家庭教育指导。

3.将取信于家长与社区作为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追求

尽管城市化背景下学校权威性和信任度所受到的挑战来自整个社会,但城市化先行国家普遍意识到,学校取信于社会的关键一环在于取信于利益关系更为直接的家长与社区。于是,一些城市化先行国家纷纷将此作为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追求。以日本为例,文部科学省早在2001年就将“使学校取信于家长与社区”^[10]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七大教育战略之一。在此后的十年中,日本政府一直将如何使学校取信于家长与社区视为一项必须应对的教育挑战。其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将家长(监护人)和本地居民的各种主张与诉求准确地反映到学校管理之中”,^[11]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学校运营协议会制度、学校自我评估制度和办学信息公开制度以保证家长和社区居民参与学校管理。在我国,鼓励家长、社区参与学校管理虽然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题中之义,但城市化先行国家的下述三项实践仍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有助于加深了解和增强信任的“有家长、社区参与的学校自我评估”。与日本做法类似,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于2007年推出有家长、社区参与的学校自我评估制度,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促使学校所在的社区对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发展情况有一个系统的认识。通过学校员工、家长及社区成员共同参与的学校自我评估,要让各方利益关切者意识到学校的进步,庆贺学校的成功。”^[12]

二是,与家长、社区参与学校评估相关联的“学校办学信息的公开”。英国政府在1991年发布《家长宪章》,“具体规定了家长有权在哪些方面、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学校教育的信息,包括有权从学校得到关于孩子的成长报告,有权阅读Ofsted对学校的督导报告,有权了解学校未来前景,有权得到学校董事会的年度办学情况报告等。”^[13]美国2001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对学校办学信息的发布提出了比前法更为严格而具体的要求,规定接受联邦经费资助的州和学区必须在2003~2004学年之前建立报告卡制度并向家长和公众发放报告卡。

三是,参与学校管理的家长、社区代表接受履职

所需的专业培训。例如在学校理事会制度较为健全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学校理事会的法定管理职能多达十余项,而且法律规定理事会会长由家长或社区代表担任。考虑到理事会中的家长、社区代表未必精通教育法规和教育教学知识,州政府便专门为学校理事会成员提供履职所需的专业培训。^[14]这一培训制度的建立,在帮助家长、社区代表正确解读学校信息和引导家长、社区合理参与学校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我国城市教育界而言,借鉴上述三项实践甚为必要,但更为必要的是,我们应像城市化先行国家那样将取信于家长与社区作为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追求,这将为我国政府和教育界有效应对城市学校权威性和被信任度下降的挑战提供助益,也将为建设社区自豪、家长信任、学生喜爱、人民满意的城市学校教育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电讯.全国农民工逾2.5亿人[N].文汇报,2012-07-18(2).
- [2]参见段成荣.法国青年骚乱对我国流动儿童政策制定的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06,(4):56-61.
- [3]严姗姗.“夹心层”少年的社会回归路[N].时代报,2012-07-09(6).
- [4]陈青.沪常住人口十年增661万[N].文汇报,2012-07-11(9).
- [5]朱莉.英国教育大臣:家庭和学校教育缺乏对年轻人纪律和价值观的培养[J].世界教育信息,2011,(10):77.
- [6]MCEETYA. The Adelaide declaration [Z]. <http://www.conection.edu.tas.gov.au/nationalgoals/1999-04-30>.
- [7]吴瑛,李益众.上海市柳营路小学探索“适应性教育”侧记[N].教育导报,2012-05-10(4).
- [8][9] OECD. PISA in focus (10) [R]. <http://www.pisa.oecd.org/2012-11-10:1>.
- [10] MEXT. The education reform plan for the 21st century [Z]. <http://www.mext.go.jp>, 2001-03-01:2.
- [11] MEXT. FY2005 White paper on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 <http://www.mext.go.jp/2006-01-30:78>.
- [12][13]冯大鸣.西方六国政府学校关系变革[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21.
- [14]参见 Victoria DEECD. Introduction to school council: a guide for prospective members [EB/OL]. <http://www.det.vic.gov.au/> 2008-12-01.

〔冯大鸣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200062〕